

流亡之書，失敗之書

——關於北島散文集《失敗之書》的幾則閱讀劄記

◎ 易 彬

連續兩天——西曆2005年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我都在半夜裏醒來。窗外，雪殘留於屋頂，天空，殘留於茫茫一片之中。這是我遭遇到的最為寒冷的冬天，一連數天，溫度都在零度以下。我沒有北方冬天的生活經驗，零度對我來說即是寒冷的極限。半夜醒來的經驗也並不多——夢魘的經驗並不多——一個出生於70年代後期的人，遠離政治文化中心，升學順利，生活安穩，又會有怎樣的夢魘呢？

所以，這樣一次連續兩次半夜醒來的經驗，成為了這次寫作最為直接的驅動力。

「失敗之書」（一）

作為一本書的標題，「失敗之書」（《失敗之書》，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太像一個標題了。

近些年來，作為散文家的北島（原名趙振開，1949年生）屢屢出現在大陸若干重要文學期刊上，《收穫》、《作家》、《天涯》、《讀書》、《書城》，等等。他的詩歌也在不斷出現，《北島詩歌集》（南海出版公司，2003）甚至獲得了「首屆華語傳媒大獎」。對此，我更傾向於認為，與其說這一獎勵是對於詩歌的敬意，不如說是對於歷史的敬意——一部標明為2003年1月出版的詩歌集獲得了2002年度的獎項，可見中國知識界對於「歷史評定」的某種急切心理——借用本書之名，是對於一段「失敗的歷史」的敬意。對於北島那些晦澀難懂的詩歌近作，人們（包括評論界）其實未必有真正的興趣，否則，對於這樣一位當代中國最為著名的詩人的近作不會缺乏有效的批評——同樣是「晦澀難懂」，70年代被不可辯駁地認為是「反革命」，那同樣也不是對於詩歌的興趣。

關於歷史，對統治者和個體而言，從來都具有不同意蘊：統治者的歷史向來是冠冕堂皇的，是沿著某一軌道不斷上升前進的。而「失敗的歷史」，作為一種永遠無法抹去的、無法篡改的生命烙印，永遠都只發生在個體層面——更確切地說，發生在少數個體身上：在「歷史進程」之中，多數個體（民眾）感受得到社會的動盪（如戰爭），物質的貧困，但不會去思考「歷史之失敗」；而某些個體，又被某種虛幻的光環所裹挾，對自我之處境難以覺察。於是，站在後續的時間點上回顧過去，「失敗」成為了一種可堪書寫的對象。

在篇首之作《艾倫·金斯堡》裏，北島記錄了1983年「『垮掉一代』之父」艾倫·金斯堡（1926年生）和他的「親密戰友」蓋瑞·施耐德來中國訪問的感受：「我對那次見面的印象

並不太好：他們對中國的當代詩歌所知甚少，讓他們感興趣的似乎只是我的異類色彩」（頁2）。在我看來，一如將這一篇排在全書之首，「失敗之書」這一書名所彰顯的也正是北島作為「流亡詩人」的某種「異類」色彩。

作者或者出版者——我不大清楚此書是按照作者的意志編排還是按照出版者的意志編排——依然願意大家停留在一種「時間差」裏——在《朗誦記》裏，北島提到了1984年「星星詩歌節」上聽（觀）眾以一種近乎狂熱的方式追逐著詩人，而詩人們（北島、顧城夫婦）被嚇得縮在更衣室的桌子底下去的場景——「那是由於時間差——意識形態解體和商業化浪潮到來前的空白。詩人戴錯了面具：救世主、鬥士、牧師、歌星，撞上因壓力和熱度而變形的鏡子。我們還險些以為那真是自己呢。沒兩天，商業化浪潮一來，卷走面具，打碎鏡子，這誤會再也不會有了。」（頁168）

停留在這一「時間差」的還包括某些特定時間的當事人，在《與久違的讀者重逢》（《讀書》，2005年第1期）中，1970年代中國「地下詩歌」潮流的見證者之一的徐曉談到：「作為本書的編者，我曾試圖說服他用早期的詩作《一切》中的第一句——『一切都是命運』為本書命名，我覺得，那不但可以喚起人們對於作者的記憶，而且可以喚起人們對於歷史的記憶。他以『失敗之書博大精深』的詩句說服我，我以為以此詮釋書名反而過於通俗。」

在我看來，至少到這本書的出版為止，這一因「時間差」而造成的「誤會」並沒有全然消散，它順應了「商業化浪潮」的規律，成為了一個小小的賣點。經由這一書名，被凸顯的多半依然是那個寫《回答》或《結局或開始》的悲壯英雄。

據說，北島的散文在海外結集出版時，名為《藍房子》。那是一篇記錄與瑞典詩人湯瑪斯·特朗斯特羅姆（1931年生）交往的文章——「那房子其實又小又舊，得靠不斷翻修和油漆才能度過瑞典嚴酷的冬天。」

我更喜歡這一書名，以文學和詩歌的名義。

流 亡（一）：遷徙

我曾以《遷徙之途》為題寫過另外一位中國詩人，穆旦（原名查良錚，1918—1977）。在我看來，終其一生，這樣一位詩人都處於一種「遷徙狀態」之中。這種遷徙起因於外在現實因素——建國前所遭遇的主要是窘迫的生存問題，為了生計（混口飯吃）而不得不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建國後，則主要是1959年初被打為「歷史反革命」後漫長的受難歷程。以二十世紀中葉至80年代之前的中國詩人（知識份子）的群體境遇觀之，這種境遇並非穆旦一人所特有，比他悲愴絕望（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他所特有的，在於這樣一種狀況——儘管外在社會現實一再地將其朝逼仄的境地擠壓，他仍然流現出一種強烈的「不安分性」：即使社會不能給年輕人提供安定的生活，他也屢屢不安於那些「沒意思」的工作；即使被剝奪了寫作和翻譯的權利，他仍傾注心力進行了大量的翻譯並留下約三十首詩歌——為了抵達理想的藝術境界和精神境界，詩人被放逐，也自我放逐——自甘於遷徙，所謂「內心的遷徙」；結果呢，那些外在的擠壓不僅沒有造設詩人的沉淪，反而不斷地激起他的生命潛能與藝術潛能——在無比逼仄的生存境況下，產生了最有個人性的詩歌和最令人激動的翻譯。

我用的是「遷徙」，而不是「流亡」，並沒有特殊用意，僅僅因為穆旦並沒有流亡。遷徙是

一個具有普範甚至中性意味的稱語。這樣一個決非人類生存本性的行為其實頻繁地出現在人類活動之中：戰爭，自然災難，政治風潮，以及文明的發展前進，無不導致了人類大規模的遷徙：搬遷，出逃（出走，逃難），流放（流浪），以及朝聖，作為遷徙的不同形態，因為涉及到人類不同力量的不斷對抗，涉及到人類總體精神狀況的發展與衍變而屢屢被世人所談及。

流亡，則是人類遷徙活動中特殊的、具有政治文化色彩的一種。它意味著從一個熟悉的家園奔向一個陌生的國度與文化，甚至，再從陌生奔向新的陌生，直至陷入完全陌生的境地——北島說，「八九至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國十五家。得承認，這行為近乎瘋狂，我差點兒沒搬出國以外。深究起來，除了外在原因，必有一種更隱秘的衝動。我喜歡……『我一無所有地漂流』」（頁152）。

70年代，已知天命的詩人穆旦隱匿於為數巨眾的受難群體之中，在書房裏挑燈夜譚，在舊信笺、小紙條、日曆等等隱秘的地方寫下詩歌——寫詩是危險的，作為一個女人的丈夫和四個孩子的父親，他必須給他們的生活以「平安」，其生命終結於一種深深的悲觀氣質。剛過而立之年的北島則奔走於「沉淪」著的中國大地，年輕，沙龍串聯，遊行對抗，入獄威脅，以及《今天》的創辦，最終鑄成了他的英雄氣質。

隱匿於受難群體中的穆旦（1976）省察了歷史的乖謬，權力是一塊無所不能的「腐蝕劑」（《神的變形》），但更多的時候，這個被「權力」不斷「腐蝕」的詩人回到了自我之內心——為自身的生命而哀挽，「生命的冬天」（《冬》）實在是過於寒冷而漫長，他再也無力邁出遷徙的步伐，他渴望卸下生命的「重載」，停歇下來（《秋》）。

在穆旦停歇的分界點上，北島寫下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回答》）。「我，站在這裏／代替另一個被殺害的人／沒有別的選擇／在我倒下的地方／將會有另一個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風／風上是閃爍的星群」（《結局或開始——獻給遇羅克》）。在那一時刻，或者說在北島的意義上，「詩歌」這一稱謂，已不僅僅關乎審美，不僅僅關乎日常生活，而更接近於一種流亡狀態，接近於流亡詩人布羅茨基（1940—1996，原籍俄羅斯，後入美國籍）對於詩歌的定義：「詩歌除了能與國家構成競爭之外，還會對自己的個性、對國家的成就和道德安全、對國家的意義提出質疑。」（《第二自我》，1990）

二十世紀中國詩人，給人印象更深的，不是遷徙（流亡），而是變聲和啞聲。被迫遷徙的情形屢屢出現，但敢於自我遷徙（流亡）並能以個人之內心承擔起這種遷徙（流亡）的，僅僅只在少數而已——穆旦與北島在一個特定時代的交會和接續（雖然彼此從未相識），正隱喻了二十世紀漢語詩歌精神的某種聚合，與崩散。

誰願意失敗呢？誰願意像一隻落水的狗一樣被失敗驅趕得滿大街跑，居無定所呢？那些不甘心失敗的，不甘心在失敗面前湮息無聲的，唯一的選擇只能是遷徙，乃至流亡——「因為我相信，逃跑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不只是你在跑，我也在跑，每一個不願與權力認同的人都在跑」（《布萊頓·布萊頓巴赫》，頁66）

酒

一年之間，兩位當年「朦朧詩」的主將，相繼推出隨筆集，讀來是別有一番滋味——記得在還沒有看到芒克（原名姜世偉，1950年生）的《瞧，這些人》（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

之前，一個京城的朋友就向我推薦，「一本充滿酒味的書」。

的確充滿了酒味——相比於《失敗之書》，相比於這個當年共同創辦《今天》的「老北島」（芒克語），我的閱讀感受是，很多地方寫到酒的《瞧，這些人》更像是一碗米酒，喝起來感覺溫溫軟軟的。芒克不過寫出了一些浮於表層的人和事而已，這些文字無關乎內心，無關乎一個「失敗的歷史時代」的緊張；相反，多有一種看破人生的態勢。比如，《顧城》一篇，顧城弑妻然後自殺身亡的行為最終歸結為一種感歎：「多麼活生生的兩個人啊，這又是何必呢！」其口氣多麼像是一個老者對於不更事的年輕人的教訓。

《失敗之書》的很多地方也寫到了酒，恍若天下之詩人——尤其是「失敗」的詩人皆好酒，如「被民主制度廢黜的」（不再擔任阿姆斯特丹詩歌節主席）「國王」馬丁，如許多風光不再的俄羅斯詩人。而酒之於飲者（作者）的精神狀態，套用《飲酒記》中的「爛醉」與「沉醉」，也可區分為兩種功效，一種是「麻醉」：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實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許願，告訴你沒有過不了的關；它從不背叛你，最多讓你太疼兩天——開個玩笑而已。頭幾年住在北歐，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發那漫漫長夜。（《飲酒記》，頁175）

有時覺得這晚過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來，鬆口氣——總算又熬過一夜。（《遊歷，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頁293）

在《朗誦記》的末尾，北島也寫到了酒：

有時面對聽眾，我會突然心生倦意。我們先人怎麼朗誦來著？把酒臨風，應答唱和，感懷贈別，生死無限（頁172）。

北島所感到疲倦的是，「詩人就像和尚，先得有個廟立足，再雲遊四方……游離在『廟』外的美國詩人極少。連艾倫（注：即金斯堡）也熬不住，被他痛恨的系統所收編。科爾索（注：一位詩人）混進去，行為不軌，又被趕了出來。對詩人來說，死還是活，這是個問題。」他寫下了一個詩人——或許是許多中國詩人所渴望的境界，一個沉醉的生命境界，一個已遠離於現實生活的境界。

酒，區分了不同的精神世界。

亡靈（一）：帕斯

我的朋友，一位執著於詩但詩名遠未隆勝的詩人，寫過一首《為亡靈彈奏》（遠人，2002），以獻給已故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1914—2002，199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除了文字之外，他僅僅在閱讀和記憶裏見過這位詩人，但這一點也不妨礙他對於詩人的敬意：

我們不再看到他的臉，記憶裏留存的肖像
不再清晰，像四月的一個凌晨，他預留的
時辰，我們無法看到
撫摸他臉龐的手掌，究竟屬於上帝
還是時間，一些謎底
永遠無法揭曉，像他沒有寫出的詩歌

被時間阻擋，我在這阻擋裏看見了永恆
——那只是一首哀歌，人類不可能抵達

北島則直接以《帕斯》為題寫到過他——在帕斯八十壽辰上（1994/3/10），北島朗誦了帕斯的《街》，一首在80年代「有點兒讓人悶得慌」的詩：

所有的黑暗無門。
重重拐角出沒
總是把我引向這條街
沒人等我，沒人跟我，
我追趕一個人，他跌倒
又爬起來，看見我說：沒人。

「沒人」原譯作「空無一人」，北島做了改動，「這樣更短促，更具突然性」——更符合80年代中期以後北島詩歌的句法結構。美國人給一個外國詩人舉行了前所未有的祝壽活動，這讓壽星帕斯「容光煥發，步履穩健，毫無病痛和大火的陰影」。但北島還是捕捉下了帕斯作為詩人的另一面：「朗誦會開始前不久，帕斯跟艾略特一起挑選朗誦的詩，他突然慌了神，對艾略特說，『我該念甚麼？它們都不怎麼樣，真的……』」此時此刻，帕斯成了另一個，更接近我通過閱讀認識的那個《街》的帕斯，他疑心重重，在黑暗中摸索，跌倒了又爬起來……」（頁40）在一些細微的舉動裏，在一首詩裏，詩人的形象得以復活，和延續。

這樣一種精神對應狀況，在部分漢語詩歌界衍變成為一種「與亡靈對話」的寫作行為。1993年，詩人評論家歐陽江河寫下了一篇後來被廣泛流傳的文章，《89後國內寫作：本土氣質、中年特徵與知識份子身份》。其結尾以這樣一種宣諭式的語氣寫到：「記住：我們是一群詞語造成的亡靈……它來到我們身上，不是代替我們去死而是代替我們活著，它證實死亡是可以搭配和分享的。在語義蘊藏和內在視域這兩個方面亡靈都呈現出追根溯源的先驗氣質，超出了存活著的記憶、恐懼和良心，遠遠伸及一切形象後面那個深藏不露的形象」。

三年後，另一位詩人評論家胡續冬指出，「亡靈」乃是90年代以來部分詩人寫作中的一個「具有揪心的語義力量的自況性隱喻」，這樣一個詞「承擔起了從社會地位到精神狀態的多層次的自我指認，它既意指了90年代詩人們的生存相對於國家話語和市民話語的雙重缺席狀態，又準確地把握了詩人內心的寫作情境在對峙語境、『集體創造』的衝動消失後面對寫作可能性的壓力時的恍惚色彩，同時又表達出了他們試圖以自我的虛位穿行於廣漠的物質實在與社會關聯的詛咒式的激情」（《在「亡靈」與「出賣黑暗的人」之間》，1996）。

在這樣一種纏繞著的句式背後，有一雙雙亡靈的眼睛在注視。

亡靈（二）：彭剛

「亡靈」，永遠都只來自於這個世界的某些隱秘的側面——來自寫作者的經驗與想像，那些引起共鳴的東西；也來自寫作者自身，某種精神缺失，或那些無可挽回的精神崩散。

芒克和北島都寫到了一個人，而且都是直接以他的名字標題，《彭剛》。

彭剛何許人也？一個與北島、芒克同時代的人。在70年代，他是一個畫畫並寫詩的「藝術瘋子」，摔壞了胳膊，扯掉繃帶，和芒克一起，兜裏僅僅揣著兩塊多錢，爬火車從北京一直到

了武漢——幻想著把「先鋒派」（僅僅有兩個成員）發展到全國各地去——最終，作為盲流，被遣送回京——對他們的生命歷程而言，這一事件「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回來狂畫，猴子狂寫，都感到自己受到了侵犯，也就是說，被刺激起來了」（彭剛：《彭剛、芒克訪談錄》，廖亦武主編，《沉淪的聖殿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頁187。猴子即芒克）。

在芒克筆下，這樣一位最終身居技術要職、迎娶漂亮妻子、兒子成雙、不時「視察」世界的彭剛，「沒死反倒出息大啦！」

在北島筆下，這樣一個彭剛，既是狂野青春的見證：「回首往事，大可不必美化青春。我們那時一個個像孤狼，痛苦、茫然、自私、好勇鬥狠」。更是青春消散的見證：「夢寐以求」的《今天》（1978）終於創辦的時候，他已是北京大學化學系的學生，他已只是「偶爾到編輯部坐坐」，當初喝酒時的承諾化為了「咧嘴一笑」：「船……太小，只能坐倆，不可能帶走所有他曾許過願的人」。之後，「隻身」去了美國。之後，拿到了美國著名大學的博士學位，最終成為了某著名公司的總工程師。他「算很成功了」，約他給《今天》（在海外重新復刊）寫稿，彭剛「這回不再提那條船了」，只是一個勁地推說，「睡覺的工夫都沒有。嗨，過日子……以後吧」。

北島的文章以彭剛自殺開頭，「他自殺，我是信其有的，為此難過了好幾天」，通篇卻都是青春年代的回憶，可見自殺不過是回憶的起因或藉口，北島所要勾勒的，在我看來，不是別的，乃是自身生命的消逝——他以另一種方式呈示了「難過」的意蘊。理想，信念——分歧，懈惰，像一堵牆的兩面，裏牆和外牆，在不同文化裏，在世俗生活裏，在時間的緯度裏，以無可挽回的方式，紛紛敗落，或慢或快。

那些神出鬼沒的「亡靈」，最終意味著對於自我生命的一種慰藉與補償。二十世紀漢語文學自身屢屢被政治文化所侵犯——屢屢削弱甚至斬斷詩人們的精神衝動，屢屢將詩人們推向逼仄的生存境遇之中——而最終呈現出一副整體性的精神虛位狀況，「亡靈」成為80年代以來某些敏銳的漢語詩人們的「自況性隱喻」，實是自有其深刻的內在動因。

在北島而非芒克的筆下，彭剛最終成為了「亡靈」。「詩人之死，並沒為這大地增加或減少甚麼，雖然他的墓碑有礙觀瞻，雖然他的書構成污染，雖然他的精神沙礫暗中影響著那龐大機器的正常運轉」（《詩人之死》，頁11）。

流 亡（二）：漂泊，無知

在《無知》（中文版，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中，已加入法國籍的原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1929年生，1975年開始定居法國）寫到了一個流亡的故事。在他看來，為了避免意識形態上的爭論，歐洲歷史上「兩個偉大的日子」需要區分：歐洲共產主義之火產生了「流亡者（或者叫大叛徒、大受難者，都可以）」，而它的解體，「使流亡者退出了歐洲的歷史舞臺；與此同時，群體潛意識大導演也停止了它最為獨特的創造，即流亡之夢的創造」（頁31）。小說中的女主角伊萊娜在這背景之下從巴黎回到了二十年沒有回過的布拉格，結果發現自己根本就無法回歸：既無法「回歸」布拉格，那些依然活著的家人、朋友不斷地向她講述「過去」的事情，對於他們在國外（流亡）的生活情形毫不關心——這意味著布拉格對所謂「流亡生活」採取了一種排斥的態度；同時，她也無法「回歸」巴黎——不僅無法「回歸」，「回歸」前的自我信念也被無情地摧毀：

他們早已了解清楚斯大林主義是一種邪惡，流亡國外是一個悲劇。他們（注：巴黎人）對我們想甚麼不感興趣。他們對我們感興趣，是要把我們當作他們的想法的活生生的證據。為此，他們才對我們慷慨相待，並為此而自豪……這時，事情就變得很糟糕了，我並沒有像他們期待的那樣行事……他們的確為我做了很多，他們在我身上看到了一個流亡者的痛苦。然而。又到了我要用回歸的喜悅來證明這種痛苦的時刻。可是沒有證明成。他們都錯了。我也是如此，因為在這期間，我一直認為他們並不是因為我的痛苦而喜歡我，而是喜歡我本人……我已不再是一個流亡者了。我不再讓人感興趣了。所以她（注：伊萊娜在巴黎的女友）客客氣氣，帶著微笑，慢慢地與我斷了往來。（頁172—174）

北島雖有流亡之實，但在《失敗之書》裏，他其實是盡量避免使用「流亡」一詞的。其出現次數全書不足十次。而且，這個詞基本上並不指向他本人——在《搬家記》中，他提到了柏林牆的「轟然倒了」，隨後卻僅僅說到：「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回不了家了」（頁152）；而對於雖同樣流亡到美國但仍然保留著一種「傲慢」的布羅茨基，他甚至流現出某種厭惡的情緒——無論在辭彙選擇還是在實際生活觀念上，已在海外「漂流」（流亡）了十數年的北島都表現出一種很微妙的態度。《上帝的中國兒子》甚至用了「誤讀」一詞：「我那困難的表情（因醉酒而頭腦不清醒）大概被聽眾們誤讀成流亡之苦」（頁27）。其潛臺詞是漫長的海外流亡生活並不苦？

《無知》終究只是小說，伊萊娜雖然最終省察了自身作為流亡者的生存困境與回歸（無法回歸的）困境，故事卻終止於她的醉酒狀態——作為流亡者，她也好酒，在某些「過不下去了」的時候，她也「非把自己灌醉才行」——她需要一種短時間之內無法喚醒的沉醉來緩解驟然省悟到的危機。但現實生活之中，沉醉終有一醒，酒醒之後怎麼走呢？沒有答案。

在《失敗之書》裏，有許多與「流亡」近似的詞，「搬家」、「流浪」、「漂泊」、「漂流」、「逃跑」、「遷徙」、「逃亡」、「旅行」、「遷移」，其中除了「搬家」外，給我印象更深的是「漂泊（流）」：

我得感謝這些年的漂泊，使我遠離中心，脫離浮躁，讓生命真正沉潛下來。在北歐的漫漫長夜，我一次次陷入絕望，默默祈禱，為了此刻也為了來生。為了戰勝內心的軟弱……「漂泊是穿越虛無的沒有終點的旅行。」經歷無邊的虛無才知道存在的有限的意義（《自序》／封底文字）。

「漂泊」這樣一種狀態使我想起了一個著名的稱語：「無物之陣」（魯迅：《野草·這樣的戰士》，1925），一個近二十年漢語知識界屢屢論及的精神話題。人類的精神狀態總是有著某些差異性的，《無知》揭寓了歐洲大陸流亡狀態的結束，以及這種結束對於流亡者本身的意義，這一揭寓對整個人類而言固然同樣有效，但依然被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緊緊包裹著的整個人類顯然未必同時進入這一「結束狀態」。

「北島曾坦言：『在海外的生活，虛無的壓力大於生存的壓力。』有人問：所謂『虛無的壓力』指的是甚麼？有人問：在漂泊的日子裏他的心理支柱是甚麼？這些是我們特別想知道的，但這些並不一定是我們能夠理解的，完全生活在不同處境中的人是不容易進入的。」（徐曉：《與久違的讀者重逢》）「心理支柱」問題自然是可以深究的，「完全生活在不同處境中的人」自然也容易造成某些「無知」，而我所進一步擔心的是，如果流亡終將是——或許早已是一種懸空的境界，如果流亡終將陷入「無物之陣」，那麼，所謂「無知」的狀

況，不僅僅指向不同處境裏的非流亡者，也指向在這種不同處境裏穿梭的流亡者自身。

「無知」，顯然需要人類的警惕與省察。

失敗之書（二）：詩與散文

在《詩人與散文》中，流亡詩人布羅茨基寫到：

平等的觀念與藝術的天性不符，每一個文學家的思想都是帶有等級的。在這一等級制中，詩歌是高於散文的，詩人自然也應是高於散文家的。之所以如此，不僅僅是因為，詩歌事實上的確比散文更悠久，而且更是因為，一個一窮二白的詩人仍能坐下來寫一篇散文；與此同時，一位處在同樣環境中的散文家卻未必會想到去寫一首詩。即使這位散文傢俱有寫作一首詩作所必需的條件，他也清楚地知道，較之於散文，詩歌所能贏得的報酬要少得多，也慢得多。（《文明的孩子》，頁136—137）

在《自序》、《遊歷，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等處，北島寫到：「我是因為生計開始寫散文的」。四年內（另一處為六年？）住過七個國家搬過十五次家，「這就是一種散文語境。這些日子你都去哪兒了？幹了甚麼？這是詩歌交代不清的……詩歌最多能點睛，而不能畫龍，畫龍非得靠只鱗片爪的勾勒連綴才成」。「寫散文對我是一種放鬆，寫詩久了，和語言的關係緊張，像琴弦越擰越緊。另外，詩歌所能表達的畢竟有限，比如對日常生活以及對人與事的記錄是無能為力的。」（頁291）

如果承認人類精神的確存在某種差異性與等級性的話，那麼，北島即和布羅茨基構成了某種對應——對應了布羅茨基所認為的那種「低一等級」的東西，艱難的生存狀況不僅改變了詩人的寫作，更是從根本上削低了詩歌神聖的地位與價值：「有限」的、「交代不清」的詩歌不過是生命的「點睛」，而不能成為更多——它不足以成為「失敗」的見證。

在北島看來，能夠作為見證的不是別的，乃是這一冊用散文寫就的《失敗之書》。北島以「失敗之書博大精深」自命，這固然凸顯出個人歷史的輾轉流離，同時，也揭寓了文學等級的根本變化——聯繫到現今漢語詩歌的實際處境，這一觀念未必不深深地烙在絕大多數讀者、評論者乃至寫作者的心中：「把酒臨風」的境界已蛻化為「將自己灌醉」的境地，寫作者的內心精神已在時間的矩陣裏發生了無可挽回的崩散，而這，顯然不僅僅是北島個人的失敗，更是時代和歷史本身的失敗。「哪兒都不適合詩人生存」，北島說（頁23）這話時的口氣和布羅茨基其實有幾分相似。不過，布羅茨基始終在強調詩歌帶來的某種尊嚴和驕傲，北島則進一步說到：「詩歌本來就是邊緣化的東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熱鬧相比，也許目前詩歌的處境更真實。」

我相信時間最終會檢驗出哪一個更為真實！對我個人而言，《失敗之書》不過是這段時間內關於70年代開始活躍的那一代人的一系列閱讀的一個代稱而已。這些閱讀，有的是新讀，有的是重讀，如《沉淪的聖殿》。以我個人的體會，《失敗之書》所呈現的，也未必是比那些不曾流亡的人更為複雜的生命經驗——北島之沉重與芒克之輕盈未必有等級之分。或者說，流亡著的北島有著一種複雜的生命經驗，但化為散文，其經驗遠未同期打開。在一篇題為《〈失敗之書〉覺悟之書》的評介文章中，年輕的作者（據猜測）即寫到：「不得不說，北島寫作的語境確實離我們遠了，這種距離能產生幻覺，也正在生成隔膜……北島寫的文字基本屬於上一代人，他們又跳出了我們當代文化的勢力範圍，於是，就有點像上一個時代的通

用幣，像是——糧票。」（王瑞芸、海豚：《北京青年報》，2004年11月11日）

一本「博大精深」的「失敗之書」最終僅僅引發了世人的一種不愠不火的感歎，這也許更為接近「失敗」的原初含義。

2005/1/2—7初稿，4/16改定 上海

易 彬 男，1976年生，湖南長沙人，1998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2001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獲碩士學位。曾任長沙理工大學中文系教師。2004年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師從吳俊教授，攻讀博士學位。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五期 2005年12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五期（2005年12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